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77

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

[德] 瓦纳尔·耶格尔 著

吴晓群 译

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77

早期基督教与 希腊教化

[德] 瓦纳尔·耶格尔 著

吴晓群 译

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德]耶格尔著;吴晓群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6.3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5505-9

I. ①早… II. ①耶…②吴…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西方
国家②文化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B979.1②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533 号

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

著 者 / [德]瓦纳尔·耶格尔

译 者 / 吴晓群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00 千字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505-9/B·473

定 价 / 2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前 言

本书是我1960年荣幸地就任哈佛大学卡尔·纽厄尔·杰克讲座(Carl Newell Jackson Lectures)教席时所做的系列讲座合集。为该教席命名的卡尔·纽厄尔·杰克逊教授将我引介到哈佛,这对我意味深长,使我能够在退休之时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为此,我对他深表感谢。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中就这些讲演的题目做过简短的讨论。在此,呈现给大家的讲座合集则是对那些内容的进一步扩展,并辅有大量注释,以此作为一本著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如此,以现在这样从演讲内容扩展而来的规模也没有完全实现我原先的计划。当我写作《教化》(*Paideia*)一书时,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部著作应该专门有一卷篇幅用来描述希腊教化是如何进入早期基督教世界,并为其所接受的。然而,尽管拙作的大部分内容在古代基督教文学领域内都已有人做过了,但该书所涉及的广大范围仍无法实现我对整本书预先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仍无法在那本著作中将历史的延续和希腊教化的传统在古代晚期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以及发生的变化全面呈现出来。现在,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还能将此放在一个广阔的规模中来处理,我甚至放弃了达至这一目标的希望。目前我已对此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决定在这些讲演中设定一些主要的大纲,然后将它们作为一种对那个整体的补偿发表出来。

幸运的是,我们手中拥有丰富的东方文献,如《死海古卷》和上埃及纳杰哈马迪(Nag-Hammadi)地区发现的完整的诺斯替教派文集,以及学界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研究兴趣的突然复活,同时不可避

免的是,我们应该彻底重新评估,在我们时代刚刚开始的几个世纪里对基督宗教—希腊文化及哲学的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第三大因素。我将这本小书视作这一全新尝试的第一步。

瓦纳尔·耶格尔

哈佛大学

1961年复活节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7

第三章 / 15

第四章 / 21

第五章 / 28

第六章 / 41

第七章 / 52

注释 / 62

索引 / 89

第一章

3

在这些讲演中,我不会将宗教与文化对立起来,视作人类头脑中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正如标题所显示的,尤其是在今日,当诸如卡尔·巴塞爾(Karl Barth)和布鲁纳(Brunner)这样的神学家们坚持认为,宗教不是文明的一个从属部分时,就如同老派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们时常将艺术、科学以及宗教混为一谈一样。换言之,我不希望在提要中讨论宗教与文化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谈到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关系问题。与古典学家一样,我将以一种历史的方法去讨论这一现象。我不想将希腊思想(如同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或帕特依神庙里所表达的那样)与基督教精神(如同恩尼斯·瑞南〔Ernest Renan〕从雅典卫城返回圣地时所做的那样)相比较。瑞南感觉自己被纯美和纯粹理性的崇高表现所征服,就如同他在卫城上热情洋溢的祈祷中所理解和赞美的那样。¹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既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同时还是一个狂热的狄奥尼索斯崇拜的信徒,他则将这种比较推到了一个极端,并且从一个古典学家变成了一个反基督的传教士。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比较,反之,我要谈及希腊文化在基督宗教出现之时的情况,以及这两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初几个世纪中的历史性交汇。不过,在本书有限的范围里,我不可能谈到早期基督教艺术,也无法涉及古代晚期和早期教会的拉丁世界。

4

从18世纪下半叶近代历史意识的苏醒以来,神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在分析及描述那与新宗教的诞生一同开始的重大历史过程

时,在所有的因素中,希腊文明在基督教思想中对确立基督教传统的最终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²最初,基督教只是晚期犹太教宗教生活中的一个产物而已。³最近发现的诸如所谓《死海古卷》这样的古代文书,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犹太教投射了一缕新的光线,与之相应地,也在那个时代死海沿岸其他宗教派别的苦修式虔诚与耶稣救世主信息之间划清了界线。表面上,两者间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其实两者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基督教的“福音传道”(kerygma)并没有停留在死海或是在犹地阿(Judaea)的边界地区,而是超越了其排他性和地区孤立性扩散到了周边地区,这是一个由希腊文明与希腊语所统辖的世界。这在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张中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其先导是希腊化时代里希腊文明长达三个世纪的扩张,而这一时期长期以来都为古典学家所忽视,因为他们不肯关注除希腊古典时期以外的其他时代。约翰尼·格斯提·德鲁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他首先发现了希腊世界的扩张,他也是第一位书写其历史的人。⁴从他已出版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他被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所激发,因为他已觉察到,如果没有这种希腊文化的后古典式演变,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是不可能兴起的。⁵当然,在罗马帝国中,基督教在说希腊语世界中的这种发展过程并非是单方面的,因为同时它也意味着基督宗教的希腊化(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教被希腊化不是一件立即就很清晰的事情。我们力图将此解释得更明确一些。

我们注意到,在使徒时代,在基督教希腊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使用希腊语,这表现在《新约》的写作之中,后使徒时代所谓的“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仍沿袭这种习惯。这也是“希腊主义”(Hellenismos)这个词最初的意思。⁶而语言问题决不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希腊语是被视作一个有关概念、思想范畴、承袭性的隐喻以及微妙的言外之意等这样一个整体进入基督教思想之中的。基督教之所以从第一代信徒开始就与其周边世界迅速同化,明确的理由显然是,首先,基督教是一次犹太运动,那些人是保罗时代被希

希腊化了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在犹太人流散时期，而且也包括他们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地区之后；⁷其次，正是那些被希腊化了的犹太人首先成为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使徒团体中被称之为“说希腊语的犹太人”（Hellenists），他们在其首领司提反（Stephen）殉教之后散布在巴勒斯坦各地，并从第二代开始了传教的活动。⁸如同司提反本人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叫斯特凡诺斯（Stephanos）一样，他们也都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诸如腓利浦斯（Philippos）、尼克罗（Nikanor）、普罗查诺斯（Prochoros）、泰门（Timon）、巴门尼斯（Parmenas）、尼克罗斯（Nikolaos），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被希腊化至少一代甚至一代以上的犹太家庭。⁹新教派克里斯蒂亚诺（Christianoi）这一名称就源于一个希腊城市安提阿（Antioch），在那里，那些希腊化了的犹太人为传播基督教建立了第一块活动区域。¹⁰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会堂（*synagogai*）中，希腊语都是通用语言。这一点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身上得到明证，他那些讲究修辞的希腊文著作不是为异教徒写的，而是为其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同胞写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后，大量新皈依的异教徒不理解，为何在离散地犹太会堂中举行的犹太崇拜仪式中会使用希腊语的原因。而保罗的整个传教活动都基于这一事实。他与旅途中遇见的犹太人谈论，力图将基督的福音以希腊语加以传播，并辅以精妙的希腊式逻辑论证。《旧约》中两段作为戒律的话语就均源于希腊文的《旧约全书》而非来自希伯来的源头。¹¹

除了《耶稣语录》（*the Logia*）、《耶稣语录集成》和《福音书》（*the Evangelia*）的新形式以外，使徒时代的基督教作家也都效仿希腊哲学家的形式进行写作，¹²他们使用希腊文写作了《使徒书》（*the Epistle*）、《使徒行传》，以及由其弟子所记载的智者或著名人物的教诲和言行等等。沿着这些线索，再加上其他类型的文献，诸如《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启示录》和《布道书》（*the Sermon*）等等，可见，基督教文学在使徒教父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替代了希腊大众哲学中讽刺与辩论学派（*the Diatribe and Dialexis*）的形式，希腊的这种大众哲学

8

曾试图将犬儒学派(Cynics)、斯多噶学派(Stoics)以及享乐主义(Epicureans)的教义向民众传播。在埃及,甚至殉教史的形式也被异教徒们所利用,殉教史是在使徒时代当埃及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激烈宗教冲突时发展起来的,在基督教殉教文学产生之前就已存在。¹³虽然,这些昙花一现的作品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仍不得不将这些希腊化时代的宗教小册子看作是许多教派自我“宣传”(propaganda fides)的一种手段。柏拉图曾提及俄耳甫斯教派的成员挨家挨户分发其教义小册子事情,¹⁴而普鲁塔克也在《给新婚人士的忠告》(*Precepts for Newly Married People*)一书中劝告女子,不要在后门接待那些试图偷偷向她们传播某种外来宗教的陌生人,因为那样可能会离间她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¹⁵在《雅各书》中,我们发现了一条来自于俄耳甫斯教的短语——“诞生之轮”(wheel of birth),¹⁶这肯定是《雅各书》的作者从某些宣传俄耳甫斯教的小册子里撷取的。这些教派就如同一个大家庭,时常相互借鉴一些词语和说法。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宣扬“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生活方式,使用“Y”作为他们的象征物,这是一个交叉道路的标志,意味着一个人不得不决定他要选择走哪条路,是做好人还是坏人。¹⁷在希腊化时代,人们了解这种教义有两种方式,当然是非常古老的方式(比如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出现的¹⁸),在一本大众哲学的文论《塞贝斯陶板》(*Pinax of Cebes*)中为我们描绘了神庙中奉献祭品的两种方式。¹⁹这篇文论充当了哲学道德说教的一个出发点,如同不可知之上帝的祭坛一样,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将一篇铭文作为他抨击的对象。19世纪发现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被称之为《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 of the Twelve Apostles*),该手册也将这两种方式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本质,这两种方式将洗礼和圣餐中的圣礼结合在一起。²⁰显然,它们是被加入了一种基督教元素,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来自于某些前基督教时期的小册子。这种带有道德格言的半文学形式的书籍和小册子,比如古希腊原子论哲学之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小册子《思想的宁静》(*Peace of Mind*)。该书开篇即说:“如果你想要享受思想的

9

宁静,那么就不要涉足太多的活动。”这本书在当时非常著名,被时人广为传阅。²¹当我在《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中发现这一训诫时十分惊讶,因为它已被改造成了基督教的诫令:“戒除诸多活动,如此你便永远也不会误入歧途。因为那些忙于过多活动的人也会犯很多错误,而且由于他们投入各种活动之中,从而无法侍奉他们的主。”²²因此,正如斐洛所常说的那样,他从其自身的经验中知道,“旧钱再次使用时会给它打上新的印记”²³。

因此,正是早期基督教的使命迫使传教士或使徒利用希腊的文学形式和演说方法去应对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改宗的,且分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大城市之中。当保罗与异教徒相接触并使其改宗时,这就变得更加有必要了。在希腊化时期,这种规劝活动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希腊哲学的特征。各种学派通过规劝演说试图为自己找寻追随者,在这种演说中,他们都会极力推销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教义(*dogma*),并声称那是达至幸福的唯一途径。我们发现,这种修辞法首先是出现在希腊智者们的学说中,以及柏拉图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之口。²⁴甚至“改宗”(conversion)这个词也是源于柏拉图,表示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表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²⁵即使这种接受的动机各不相同,基督教的福音宣讲中提及人的无知,并承诺上帝将赐予人类知识,如同所有的哲学思想一样,它将此归因于某个主人或导师,祂拥有并揭示真理。这种希腊哲人与基督教传教士的类似做法可视作后者对前者的利用。哲学家的上帝与传统异教中的奥林波斯诸神也是不相同的,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体系为其追随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庇护所。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则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而且如果我们相信《使徒行传》中的记载,那么,他们有时甚至从其先辈那里借用其辩论中的论据和论点,尤其是当他们与一个受过教育的希腊倾听者交谈时更会如此。²⁶

这就是在希腊人与基督教徒邂逅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基督教未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也正是有赖于此。《使徒行传》的作者让使徒保罗去往雅典时,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雅典作

10

11

为古典希腊世界的文化与知识中心以及历史传统的象征，保罗在庄严的阿瑞奥帕戈斯山(the Areopagus)上向斯多噶学派的听众以及伊比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布道，向他们宣说那不可知的上帝。²⁷他引用了一位希腊诗人的诗句，“我们都是他的子孙”，而他的辩论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多噶式的，且被认为可以说服某个受过教育的哲学头脑。²⁸无论这一难忘的场景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戏剧性地再现了基督教世界与古典世界之间最初进行智力较量的历史性局面，这一幕都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使徒行传》的作者是怎样理解的。²⁹这种讨论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保罗选择了希腊哲学传统作为这个基础，在那个时代，对于生活在希腊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来说，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稍后一点的基督教作家，即《使徒腓力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 Philip*)的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其写作意图：模仿权威的《使徒行传》，他让他的主人公来到雅典，像保罗一样针对相同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听众发表演说。他让使徒腓力说，“我来雅典是为了向你们宣示基督的教化”。而那正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想要做的。³⁰基督教呼唤基督的教化，模仿者们强调，使徒的意图是要使基督教成为古典希腊教化的一种延续，这对于那些拥有旧文化传统的人们来说是符合逻辑的，也是能够被接受的。同时，《使徒腓力传》的作者还暗示，古典教化将被一种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文化所取代。由此，古代教化就成为了它的工具。

12

第二章

在使徒时代之后不久，基督宗教中最古老的可确定年代的文献是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写给科林斯人的信件，时间是在公元1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观察基督教思想在保罗死后三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保罗曾亲自写信给同一个哥林多教会，为的是要解决科林斯人对基督教信仰解释中的派系斗争与分歧。现在，在科林斯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拒绝承认其主教的权威，而且，那里的教会与基督教正统公开不和。克莱门作为罗马主教，以教会代表的立场致信科林斯人，以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¹

13

以古代修辞学的技艺方式，他用许多经过精心挑选的“事例”(hypodeigmata)向科林斯人证明“党派之争”(stasis)与不服从的可悲结果，而且，他还将此与团结和服从所得到的赐福相对照，像德摩斯梯尼一样，他将遥远过去的事例与其他近世以来其读者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中所熟知的例子恰当地区分开来。²当他谈及重点时，根据修辞学的规则，要加上最可怕的惯用语句(topos)：“内在的不和已打倒了伟大的诸王，并倾覆了强大的国家。”但克莱门没有采用那些已有的例子，以免陷入俗世的历史过深，不过他的确是采用了政治辩论的规则。我们还记得，在希腊城邦的古典时代，“和谐”(homonía)一直都是调解领袖、政治教育家、诗人、智者以及政治家们的口号。³罗马时期，康科迪亚(Concordia)甚至成为了“协和女神”。我们可在罗马的硬币上看到她的图像，她被罗马帝国的历任统治者、被各个城市带入到罗马人的私人婚礼以及各种节日庆

14 典之中,为人们所呼唤。哲学家赞美她统辖宇宙、维持世界秩序与世界和平的神圣力量。因此,我们毫不吃惊地再一次发现,克莱门在他精彩地论及万物之宇宙秩序的第20章中,将创造者上帝的意志归结为最终原则,为人类生活与和平合作的一个可视模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的例子一定鼓舞了克莱门,让他再次重现希腊的古典传统。保罗给科林斯人讲了一个有关争斗的著名故事,因为争斗将人体分成了两个部分。他们拒绝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完成各自那部分的特别功能,直到他们被迫明白,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只能相互依靠才能生存。这正是米尼聂乌斯·阿古利巴(Menenius Agrippa)告诉民众的那个神话故事,当时,罗马平民决心不再与贵族住在一起,正准备从罗马城迁移到圣山(Mons Sacer),他以此神话劝告平民回归罗马城。我们都是从李维的书中得知这一故事的,但它也曾出现在几个希腊史家的著作里。⁴这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希腊智者有关“和谐”(Homonoia)的辩论之中。⁵然而,克莱门的证据是不一样的。他罗列了宇宙中所有关于和谐互助的例子。⁶关于这一讨论我们也可追溯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腓尼基妇女》(Phoinissai),剧中伊俄卡斯达(Jocasta)试图说服她暴虐的儿子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与遭放逐的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平相处,认为这对于他来说才是唯一自然的途径。⁷显然,许多迹象表明,克莱门在他的讨论中使用了一个斯多噶学派的材料。⁸这一资料是对和平与和谐的热情赞美,认为和平与和谐主宰着自然万物、昼夜轮回、天体的有序运转,乃至最小的创造物也遵循此规律,比如蚂蚁、蜜蜂也拥有自己美妙的社会团体。

有意义的是,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古希腊城邦政治哲学的理想进入了基督教这个人类新团体的讨论之中,只不过现在这个团体被称之为“教会”,而非希腊的“公民大会”(ekklesia),它原初的含义是指一个希腊城邦的公民团体。科林斯,之后为亚该亚(Achaia)省的首府,这是一个希腊地名,在罗马行政管理的官方语言中也如此称呼,在那里,圣灵的各种载体相互竞争,教师与先知都通晓各种语言,那就是狂喜教团(ecstatics),⁹正是在罗马这样的土壤之中,

一种新的秩序感诞生了,并且产生了一种对希腊城市个人主义的强烈吁求。¹⁰ 罗马殉教者彼得和保罗的名字就是克莱门为他们取的,以将其作为服从的典范;而谦恭的终极典范则是基督自己,这甚至成为罗马军队可资效仿的一个参考。¹¹

虽然,保罗对于信仰的强调在克莱门的《使徒书信》中仍保持不变,但克莱门着重强调的则是善行,这与《雅各书》一样,它们可能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显然这也是与保罗有分歧的地方。¹² 可见,基督教的一整套美德体系正逐步从克莱门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呈现出来,基督教的概念更接近于斯多噶派的道德说教,而非圣保罗的精神以及他给罗马人的书信。因此,基督教宣讲的福音能够被理解和接受,当然也就是不足为奇了。基督教的解释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可以从《新约》中得到证实,其思想贯穿所谓的《教牧书信》(*Pastoral Letters*)之始终。犹太教肯定喜欢这种解释,因为对于克莱门及其同时代的人而言,即使是对保罗那一代人来说是重要事务,如犹太仪式法规也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他们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一样有着一种理性的道德趋向。¹³

如果我们想要描述克莱门书信的精神,只称赞它是一封体现了兄弟之爱与基督教慈善精神的信件,那是远远不够的;或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愤怒的宣泄以及对科林斯教会事务的干涉,也是不对的。这并非科林斯人的问题,在其背后隐含着一个教会的概念。我们发现,在罗马教会关于和谐与团结的长篇且强有力的宣言中揭示了基督宗教的基本信念,即如果基督教想要组成一个真正的团体,那它就需要一种内在的纪律,类似于一个组织良好的城邦将公民聚集在一起的那种纪律,这种纪律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它渗透于每个人的心中。对于本地教会而言,早期基督教仍为多元主义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他们也不能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言行的自由是有所限制的,如果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姊妹教会感觉其言行过度就会表示不赞同,并由他们中的一员、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精神及道德权威公开地表达出来。从信中可见,有人认为,科林斯的混乱状态需要这样的公开训戒,同时还认

16

17

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基督教世界中除了罗马教会以外,不存在其他权威能宣称其有权在公开场合发声。

这封信并非代表个人。克莱门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信中,但却在手稿传统中以铭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而且,他被科林斯人和此事不久后他们的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作为作者提及,大约公元170年,该信的部分内容仍在礼拜中为下一代的科林斯人所阅读。不过,克莱门避免作为该信的作者和个体出现在信中,这给科林斯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懂得在基督教教会中的公共纪律与秩序。

18 克莱门在教会这个人类社团中建立了有关秩序与和平的概念,这一方法表明,基督教会是建立在对所涉及问题的自觉的哲学反思上的。克莱门似乎觉得,仅仅是对科林斯人十分缺乏的“大爱”(agapé)或仁慈(《哥林多前书》13)这种情感吁求加以重复是不解决问题的。他们的前辈领袖肯定已多次发出这种吁求了。但因为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受过教育或接受过希腊教化的,所以,他强调在基督教“政制”(politeia)中市民秩序的双重哲学背景,即政治经历、社会伦理与宇宙论哲学。这在希腊教化中也是一样的,它总是从宇宙——即所谓“自然”(physis)——的神圣准则得出人类及其社会的行为准则来。基督教的诠释者们(不仅仅是他们!)应该记住,希腊人关于自然的概念与我们现代观念中的自然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而几乎是恰好相反的。我们发现,不仅是在该信著名的第20章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人类世界的和平问题有着宇宙的面向,而且在随后的章节中,同样的观点也贯穿始终,即使以现今的事例而言,它也总是与这种观点的实际运用结合在一起。以一个希腊人的眼光来看,这并没有使这种关于原则的反思减弱其哲学性,因为理论和生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它们以这种方式被19 人们所理解时,哲学家才能保持他对真正教化的传授。

在这一点上,克莱门又一次重提他所深深扎根的古典教化传统。当他以基督教的方式来解释基督道成肉身的合而为一时,从希腊政治思想中所继承的社会有机概念在他手中几乎变成了一种

神秘主义的意思。这种源于保罗的有关教会的神秘观点，被克莱门以希腊政治经验的智慧及推测予以填充。第 37 章中，在指出罗马军队与其等级的纪律相对应之后（这是人们对帝国内非罗马人感到既惊讶又好奇的一个方面。对于罗马军队所具有的组织纪律性以及战无不胜的力量，波里比乌斯〔Polybius〕曾向希腊人做了长篇描述；而约瑟福斯也同样对犹太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克莱门回到希腊悲剧，并引用索福克勒斯或欧里庇得斯的诗句，他或许只是从某个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字句：伟大若无渺小陪衬便无法存在，反之亦然。索福克勒斯在其悲剧《埃阿斯》（*Ajax*）的著名合唱（158）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是这种感受在克莱门的信函中则是与综述同时出现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所有事物中都有一个适当的混合，它使得人们的实际运用成为可能。这种观念与人类社会大小相依观念的结合并未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阿斯》中，但是我们却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埃俄洛斯》（*Aiolos*）残篇（21）中发现了类似的诗句，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事实上，他们的发现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力图从中确定，在罗马，希腊教化作为一种鲜活的传统仍存在于说希腊语的基督教社团之中。该团体说希腊语是因为在整个公元 1 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中间都包含有被希腊化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能够用古典教育的语言为科林斯人提供一种基督教式的批判。对于他们而言，这不仅是关乎风格的事情，而且还暗示了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即对待任何问题都可以某种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便是希腊教化最独特的标志。

被我们翻译成“适当混合”（*proper mixture*）的这个希腊文是指一种特殊的混合，希腊语称之为“*krasis*”，它与仅是各种元素简单并列而无相互的“渗透”（*mixis*）很不一样。克莱门与欧里庇得斯两人都是在“*krasis*”与“*synkrasis*”相调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的，强调相互渗透的概念，其用法甚至强过一个简单的名词。因此，我们应该将其翻译为“混合”（*blend*）。这几乎是一个带有技术含量的词，有着一段很长且很有趣的历史。它早期运用在希腊医学思想